

# 从米歇尔·福柯视角阐释简·爱主体性建构模式

廖金罗

(广东科技学院 应用英语系, 广东 东莞 523083)

**摘要:**简·爱被认为是一个“敢于反抗、敢于争取自由和平等地位”的典型女性叛逆者形象。然而,人的生物存在受到生产存在的影响,人的精神存在再现特定社会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对生命个体灵魂和身体的训诫作用,反映个体生命对待灵魂和身体所受到的训诫作用的策略。《简·爱》讲述在当时以传统封建主义生活方式和新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占统治地位的英国社会对生命个体的心灵和身体的训诫作用以及生命个体对待训诫作用的策略。简·爱“既反抗,又合作”的主体性建构模式仍只是一种个体生命被工具化的模式。

**关键词:**《简·爱》;简·爱;福柯;主体性;主体性建构模式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6)02-0085-06

简·爱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批判现实主义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自传性小说《简·爱》的女主人公。长期以来,简·爱被认为是最典范的女性叛逆者形象。有人认为《简·爱》不仅冲击传统观念,而且“践踏了受到我们祖先尊奉并一直使国人引以为荣的传统习俗”<sup>[1]</sup>。他们斥责作品具有“颠覆固有的社会、文化、政治秩序”的意图。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者认为《简·爱》代表女性反抗父权制压迫的胜利。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性主义者开始质疑《简·爱》的反传统性,认为《简·爱》并没有反叛传统体制,相反,在某种程度上,维护父权体制。如佳·查·斯皮瓦克认为女主人公所追求的“伴侣意义上的爱”以及约翰·里维斯为“社会使命”而殉道都不折不扣地体现出对传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体系的维护<sup>[2]250-270</sup>。

简·爱作为典型女性反叛者形象之所以受到女性主义者的质疑,一是因为在简·爱的性格中确实存在矛盾;二是因为“人的性格特征从来就不是天生的、内在的或者永恒不变的本质属性,而是后天的、建构的和不断流动的个体属性”<sup>[3]</sup>。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的生物存在不仅受到自然界和客观规律的制约,而且受到人类物质文化生产再生产过程中的内在规律的制约,因此,人的生物存在从来就不是一个独立于特定社会的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影响的过程。个体的物种存在受到生产存在的影响,个体的精神存在是个体物种存在和社会存在之间的调节器,因此,性格只不过是个体在特定环境中根据自身权力和权力之间的对比关系制定的自我需要满足和自我意识实现的生存策略。20世纪8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之所以质疑简·爱作为一个“敢于反抗、敢于争取自由和平等地位”<sup>[4]</sup>

收稿日期:2015-11-19

作者简介:廖金罗(1967-),男,湖南湘阴人,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和文艺理论。

的典型女性叛逆者形象,不仅是因为简·爱的反抗丝毫没有动摇传统价值体系,而且是因为简·爱的反抗只是个体从社会中获得物质、满足自身需要的策略。一旦某种物质和精神需要获得满足,简·爱就屈从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实。简·爱既反对以封建地主阶级和新兴资本家阶级为代表的父权制社会,又和男性合作,并且在和男性合作过程中充分体现自身作为女性的优势,建构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简·爱的这种“既反抗,又合作”的主体性模式已经突破传统文化的“二元对立”特征,呈现出多元性特征。因此,简·爱代表的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女人,而是主体性建构的一种可能性模式。

## 一、福柯理论

米歇尔·福柯认为:“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权力运转着。”<sup>[4]</sup>从实质上讲,权力不是一个物的概念,而是各种力量关系的、多形态的、流动性的场。因而,……权力纯粹是一种关系,是一种结构性的活动<sup>[5]</sup>。“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sup>[4]27-29</sup>。显然,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掌握了权力,而在于权力的运作机制,在于权力的策略、技术、机制和实施手段。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提出作为权力运行的机制的“规训”。“规训”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出一种能够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且符合社会一切要求的成熟的社会个体。最能充分体现这种规训权力的机制就是边沁通过独特的透明化结构保证对犯人时时刻刻地进行自我监视以及使每一个人都慢慢地自觉地实现自我监禁,自觉地接受道德改造所设计的“圆形监狱”。“圆形监狱”的最大特点就是过去统治阶级对犯人身体的残酷惩罚通过技术手段和专业话语变成一整套标准化的规则,将肉体的酷刑和身体的监禁变成灵魂的钳制和自我监禁。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现的。在文明社会中,规训权力在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中存在并且发挥着作用。工厂、学校、军队、监狱和家庭都类似“圆形监狱”。在《简·爱》中,盖兹海德、劳渥德寄宿学校、桑菲尔德庄园和沼屋都是一所所通过特定技术手段将植根于封建地主阶级生活方式和新兴资本家阶级生活方式之中的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植入和灌输到被统治阶级的头脑中,将被统治阶级制造成符合统治阶级价值期待的、具有驯服的身体和归顺的合格的臣民的“圆形监狱”。

在《简·爱》中,盖兹海德、劳渥德寄宿学校、桑菲尔德庄园和沼屋之所以是一所所“圆形监狱”,主要是因为这些家庭和组织渗透着植根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生活方式和新兴工商业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之中的文化价值。在19世纪中期,英国正经历由传统封建主义自然经济向新兴工商业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过渡。一方面,传统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生活方式正在没落,在传统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生活方式之中相互转化的自然经济、贵族政治和基督教文化的内在需要正在逐渐萎缩;另一方面,新兴工商业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正在形成,在新兴工商业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之中相互转化的工商业经济、民主政治和基督教文化的内在需要正在形成和日趋强烈。在这一特定时代,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生活方式和工商业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不仅同时存在,而且相互矛盾和相互融合。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和融合决定了英国在这一历史时期需经历巨大变革。这是两种经济形式之间的竞争和融合、两种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和对接、两种文化价值体系之间的交锋和磨合、两种道德观念之间的对撞和妥协。这种“既矛盾,又融合”的特征不仅反映在社会的组织和机构中,而且也反映在生命个体的性格特征里。在研究勃朗特姐妹的专著《权利的神话》一书中,特里·伊格尔顿指出:“夏洛蒂的作品存在一种固有的,两种模糊并内部分裂的价值观之间的斗争。即女主人公一方面表现出理性,冷静,自我奋斗精神,激进的反抗和叛逆;另一方面则过于虔诚,服从,保守。”显然,在夏洛蒂的作品中存在的这种固有的,两种模糊且内部分裂的价值观之间的斗争就是当时在英国社会里的传统封建主义自然经济方式和工商业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和融合的反映。另外,在《简·爱》中,盖兹海德、劳渥德寄宿学校、桑菲尔德庄园和沼屋之所以是一所所“圆形监狱”,还因为舅妈、表兄、布

洛克尔·赫斯特、罗彻斯特和圣·约翰类似在“圆形监狱”里工作的“狱警”。

## 二、主体性建构过程

《简·爱》以第一人称方式叙述主人公简·爱从8岁到18岁稍后这一段时间在盖兹海德庄园、劳渥德寄宿学校、桑菲尔德庄园和沼屋的生活经历,这些经历对她的影响以及作者对待心灵和身体规训作用的策略。

类似“圆形监狱”的第一个场所就是盖兹海德。大概是8岁时,简·爱被迫寄住在舅妈家。毫无疑问,在简·爱与表兄、舅妈和白茜之间存在着以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认知方法和行为模式为特征的主体性差异。简·爱的舅舅里德先生家是当时在英国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生活方式和工商业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代表。他们一家人和保姆已经认知和内化于传统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生活方式和工商业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中相互转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内在规律,并将这些内在规律制定成为自身行为的标准和心灵的家。舅舅里德先生死后,舅妈里德夫人和表兄约翰·里德先生就成为里德家的“主人”。乳臭未干的表兄深知在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生活方式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之中的内在规律,声称:“家是我的,或者过几年就是我的了”<sup>[6]</sup>。作为简·爱的监护人,舅妈和表兄为简·爱提供生活必需的物质资料,因此,他们期待简·爱学会感恩以及学会屈从他们的意愿,然而,一方面,简·爱的的确确年幼无知;另一方面,父母的过早逝世使简·爱没有接受并融入社会的价值体系,在纷乱无序的世界里不知所从,任童年的天性恣意发展。年幼无知的简·爱只知道小孩争斗的游戏以及为自己在游戏争斗中的不公平待遇而叫屈,根本不知道盖兹海德这一“圆形监狱”的规训法则。简·爱也知道她和盖兹海德庄园之间存在的矛盾。例如,“我在盖兹海德府,是个和大伙儿合不来的人:我跟那儿的谁也不相像;我跟里德太太,或者跟她的孩子们,或者跟她宠爱的下人,都没有一点一致的地方”<sup>[6]</sup>。然而,白茜认为:“太太好心好意把你和两位里德小姐、里德少爷一块儿抚养长大,你可不该因此就以为自己和他们地位相等。他们将来都会有不少钱,而你连一个子儿也不会有。你就得低声下气,顺着他们。”<sup>[6]</sup>“你该学得有用一些,学得乖巧一些,那样的话,你也许还能把这儿作为家住下去:不过,要是你再发脾气,再粗暴无礼,我敢说,太太准会把你撵出去”<sup>[6]</sup>。显然,崇尚天性和个性的简·爱既没有认知又没有内化于封建地主阶级生活方式和新兴资本家生活方式的内在规律中,更没有据其归顺自身灵魂和标准化自身身体行为,实现舅妈、表兄和白茜以及她个人的价值期待。

简·爱与舅妈、表兄和白茜之间的这种价值观矛盾不断地上升为人际矛盾和人际对抗。舅妈、表兄和白茜试图通过话语、分离和剥夺等方式迫使简·爱屈服。然而,倔强的简·爱并没有向现实屈服。最后,简·爱被气愤的舅妈关入红房子。在红房子里,简·爱努力平息自身。然而,平息之后的简·爱却充满了内心世界的矛盾、心灵的回忆和头脑的幻想。

类似“圆形监狱”的第二个场所就是劳渥德寄宿学校。学校是一个讲求规训化、充满控制和训诫权力的处所。学校通过制定专业话语和运用技术手段最典型地代表在特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价值体系。学校把学生,甚至于最调皮的学生,制造成统治阶级认可的最驯服的身体和最合格的臣民。劳渥德寄宿学校是一所慈善性质的寄宿学校,典型地代表当时在英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生活方式和新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价值体系。一方面,校长布洛克尔·赫斯特标榜通过惩罚肉体,从而拯救灵魂;另一方面,他利用学校经营权敛集钱财。在学校里,学生的伙食差,生活环境不卫生,孩子们不仅受冻挨饿,而且遭到挨打、罚站、剪头发等凌辱。“半饥半饱,感冒又没有及时治疗,这就注定了大部分学生要受到传染:八十一个姑娘中,一下子就病倒了四十五个”<sup>[6]</sup>。显然,这不是慈善机构,而是人间地狱。

在劳渥德寄宿学校,处于被动地位的简·爱需要认可和接受以布洛克尔·赫斯特为代表的劳渥德学校管理方的价值体系。然而,简·爱始终不能认同管理方的价值体系。显然,简·爱和管理方之间的这

种矛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在不断加剧。在劳渥德学校,校长布洛克·赫斯特通过谎称简·爱是一个撒谎者加强对简·爱的身体行为进行管理和监控。简·爱和像她一样的学生们不仅受到肉体的管理,而且受到灵魂的规训。面对学校的规训,简·爱曾经对海伦·彭斯说:“当我们无缘无故挨打的时候,我们应该狠狠地回击:我肯定我们应该回击——狠狠地回击,教训打我们的那个人。叫他永远不敢再这样打人。”<sup>[65]</sup>显然,简·爱试图反对极端压抑人性和钳制思想的学校管理制度。这种反抗一直持续到在发生一场疾病之后劳渥德学校改善了相关办学条件才有所缓和。后来,简·爱遇到好心的谭波尔老师。谭波尔老师对简·爱关怀备至,简·爱的灵魂得到感化。显然,好心的谭波尔老师和稍微改善的办学条件才使简·爱的生活得到一点儿改善,才使她有可能去认同劳渥德学校办学方的价值体系,并且根据这些价值体系改造自己的灵魂和调整自己的身体行为。

类似“圆形监狱”的第三个场所就是桑菲尔德庄园。罗彻斯特是主人,简·爱是家庭老师。罗彻斯特通过目光的凝视把自己的需要和文化期待传递给简·爱。从这些目光的凝视中,简·爱认知罗彻斯特的文化期待,根据这些文化要求建构自身的主体性。在表层意识里存在着平等、自由和博爱等资产阶级思想,罗彻斯特表面上认同简·爱的平等思想。但是,在个体无意识最深处始终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思想。罗彻斯特没有从心底里真正地把简·爱当成独立的和平等的个体,而是试图凭着经济优势、政治优势和社会阅历上的优势使简·爱变成经济上的依附者、文化上的被建构者、认知上的客体和生活中的情人。当他的求婚得到简·爱的响应后,隐藏在罗彻斯特无意识最深处的父权思想流露出来。他试图通过挥金如土和购置绫罗绸缎等经济手段迫使简·爱成为他的情人。相反,简·爱之所以接近罗彻斯特,一是因为在他们之间存在雇佣关系,二是因为简·爱希望得到爱情。然而,罗彻斯特的举动激怒了简·爱。简·爱感觉自己像被苏丹王恩宠的奴隶一样被剥夺,愤怒地说:“你以为我是一台自动机器吗?一台没有感情的机器吗?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世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这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sup>[62]</sup>显然,在简·爱和罗彻斯特之间存在价值取向的矛盾。简·爱渴望得到平等的爱情,很讨厌自己被“打扮成一个玩偶”,反对自己被称为“天使”。当她被称为“罗彻斯特夫人”时,简·爱感到一种“恐慌”。面对着经济弱势,试图维持经济独立的简·爱声明在婚前自己仍然以教书为生,自食其力。当罗彻斯特与巴莎的婚姻真相被揭穿后,简·爱面临一个重大的抉择:做罗彻斯特的情妇,还是做自己的主人?海伦·彭斯的例子告诉她:放弃就等于死亡。强烈的自我意识使简·爱选择了后者。简·爱宁愿在穷乡僻壤当一名“自由和正直的乡村女教师”,也不愿苟且偷安做别人的附庸。

类似“圆形监狱”的第四个场所就是沼屋。传教士是一种思想载体和文化工具。圣·约翰冷酷无情,声称自己的天职就是去印度传教,希望以“上帝”的旨意为借口要求简·爱嫁给他,并且和他一起去印度传教。而简·爱没有屈从于封建地主和资本家阶级的价值体系,更不会主动地牺牲生命个体的特征而成为思想的工具。她认为这种牺牲个体生命特征太可怕,“在跟和我自己的性格相反的独断严酷的性格打交道的时候,在绝对服从和绝对反对之间,我一生中从来不知道有什么折衷的办法。我总是忠实地绝对服从一直到爆发,变为坚决反抗为止”<sup>[62]</sup>。

### 三、多元化主体建构模式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在《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中宣布“上帝之死”。米歇尔·福柯在《词和物》中宣告“人的消解”和“人之死”。福柯认为人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按某种规范某种模式被塑造出来的。当然,福柯的“人之死”不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死亡,而是指作为一个“先验的、预设的和统一的”人的死亡以及“大写的、理性的和总体的”人的死亡。伴随福柯的“人之死”便是福柯的“人之生”。过去被设定为超验的、无所不知的和万能的人已经死了,人已经变成一种有限的和被宰制的人。一种旧人的

死亡必然召唤着一种新人的诞生,“一种小写的、感性的和个体生命的人的”诞生<sup>[7]129</sup>。

人是一种生物存在、生产存在和词语存在的被组合物。人不是超验的,人的存在也不是无限的,因此,人不可能像康德一样安静地在自己被安排的环境中生活。人的生存是有限的<sup>[8]171</sup>。一旦确立起有关有机生命、经济生产和历史语言的理解,就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物种存在、生产存在和词语存在的人的概念。于是,“人”就产生了。人是一种通过自己的劳动维持自身生物存在的动物。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人类的物种存在不仅受到自然界和客观规律的制约,而且受到人类物质文化生产再生产过程的影响。也就是说,人的物种存在受到生产存在的影响,人通过语言表达生产存在对自身物种存在的影响。人不再具有灵魂,不再具有自由意志,不再神圣。人是生活方式的媒介,是实现在生活方式之中的相互转化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内在需要的工具。

在文艺复兴时代之前,人没有作为现代意义的主体性。文艺复兴时代唤醒现代人以追求“自我价值”为特征的主体性意识。人的主体性意识在于人成为生活方式媒介以及成为实现在生活方式之中相互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内在需要工具。然而,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生命被实现媒介化以及工具化这一生产存在慢慢地消泯,最后成为一种理想或者主义的表象。人不再是人,人已经失去自己的生物存在,人是工具。人的主体性也正是被媒介化和工具化过程所扼杀,人的全部存在和主体性特征就只能通过话语获得认证。

从柏拉图以来,西方文化一直用二元论来对事物进行划分和研究。男性与女性、理性与非理性、理智与冲动、客观与主观、反抗与屈从,等等,这些二元的组合把世界分成相对的领域和对立的两极。二元划分的思维模式已经严重地影响社会的建构和主体性特征的建构。迄今为止,人类既没有见证过男人和女人真正平等和真正和谐相处的两性平等社会,也没有见证过生命个体和生活方式和谐相处。西方女性主义者在被世界大战摧毁的西方男权世界和男性文化基础上获得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试图建立男女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或许,简·爱这种既反抗男权社会和男权文化,又部分地向现实屈服、和男性合作,并在和男性合作中展现自身优势,根据差异建构相互需要和相互合作的社会有可能会是多元化主体建构模式的一种尝试。但是,这种主体性建构模式仍只是一种个体生命被工具化的模式。

很久之前,人和动物共生共荣,世界上没有作为主体的人,当然也就没有作为客体的人。文艺复兴之后,近代意义上的人产生了。人开始作为认知主体进入世界,一旦作为主体的人进入世界,作为客体的人也就产生。在近现代,每一个人都在建构自身主体性,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便成为他的客体。同样,他也成为了别人建构自身主体性的客体。一方的主体性建构需要另一方成为其主体性建构的客体。显然,主体性建构是一切之根源。只有主体性建构的停止,世界才能和睦。

#### 参考文献:

- [1] Anonymous. The Last New Novel [J]. The Mirror, 1847(2):360-389.
- [2] Spivak Gaytri Chakracorty.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M]//Rac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5.
- [3] 廖金罗. 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和莎士比亚悲剧成因的后现代主义阐释[J]. 外语学刊, 2009(6):184.
- [4] 米歇尔·福柯. 必须保卫社会[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 [5] 陈炳辉. 福柯的权力观[J].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4):84-90.
- [6] 夏洛蒂·勃朗特. 简·爱[M]. 吴均燮,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 [7] 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M]. 谢强, 马月, 译. 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8.
- [8] 汪民安. 福柯的界线[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2.

(下转第 115 页)

- [4]王 晶,陆冷飞.基于优先级考试自动编排的算法研究[J].电脑知识与技术,2008(8):1451-1454.  
[5]冯向萍,张太红,李 萍.高考考场编排算法研究[J].新疆农业大学学报,2008,31(3):106-109.  
[6]王文发,张根耀,马春梅,等.基于考生比例的考场编排问题的分治算法[J].计算机工程与设计,2010,31(12):2872-2875.  
[7]高 昊.基于混合算法的研究生招生考试考场座位编排系统研究及应用[D].长沙:中南大学,2011.

## Research on the Algorithm of Examination Arrangement for Postgraduate

Zhang Xizhong<sup>1</sup>, Yang Sulin<sup>2</sup>

(1. Baoding Education Examinations Authority of Hebei,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2.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of Hebei, Baoding, Hebei 071001, China)

**Abstract:** The examination arrangement is important for routine examination management. It has a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enhancing discipline and the credibility of the exam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ostgraduate examination arrangement in Hebei Province, an algorithm of examination arrangement was introduced based on the number of examination subjects in this paper, and the detailed procedure of the algorithm is given 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rationality and validity are exam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lgorithm is absolutely correct, high running speed, high efficiency, easy to achieve and easy to promote.

**Key words:** master degree candidate; examination arrangement; the principle of the number of subjects in the examin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subjects

(责任编辑 石丽娟)

---

(上接第 89 页)

## Interpretation of Jane Eyre's Pattern of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Michel Foucault

Liao Jinluo

(Faculty of Applied English,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ngguan, Guangdong 523083, China)

**Abstract:** Jane Eyre has been consistently considered as a lady who dares to oppose and who dares to struggle for equality and freedom. Nevertheless, human biological existence is affected by economical existence and human spiritual existence is an embodiment of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factors, political factors and cultural factors in a specific society on human souls and human bodies and human spiritual existence is a record of individual strategies for discipline. At that time, the dominating lifestyl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were characterized by a combination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feudalism natural economy and the newly rising bourgeoisie. *Jane Eyre* is a story about the roles which the dominating lifestyles on human souls and human body action and *Jane Eyre* is also a story about the strategies of individuals for the discipline. Jane Eyre's pattern of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characterized by both opposition and cooperation is a means of instrumentalization.

**Key words:** *Jane Eyre*; Jane Eyre; Michel Foucault; subjectivity;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责任编辑 陈 静)